

# 今日評論

第二卷第四期

時評

最高統帥七七的文告(平)

肅清私存煙土(青)

英國擴充對外信用放款的提案(魯)

說爲政不在多言

最近兵匪的變動

近仇民族主義之產生

歸途

美國與中日戰爭(通信)

國立北平圖書館藏

潘光旦

李卓敏

谷春帆

董楚

民國二十八年七月十六日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 時評

## 最高統帥七七的文告

我最高統帥軍事委員會委員長於七七抗戰二週紀念日有五篇重要文字發表：一爲告全國軍民書，二爲告各友邦書，三爲告日本民衆書，四爲慰問陣亡將士家屬電，五爲向戰地民衆廣播演講。這五個文告是互相關連的。全國軍民需要指導及督促，戰地民衆需要鼓勵及安慰，陣亡將士家屬需要慰問及扶助，必三者備，而後我中國人民能盡抗戰的責任。友邦應知我國抗戰不僅爲保國，抑且有利於世界的和平，日本民衆應知日本軍閥之窮兵黷武及我國人民對日本人民的同情。必五者兼備，抗戰才能早日成功，而抗戰的結束亦可促進全世界的和平。將五篇文告一氣讀畢，可以見到我最高統帥的高瞻遠矚。

對於國人最關重要的當然是「告全國軍民書」。該書說一年來抗戰建國的工作效率比年前有進步，而人民的抗戰意識亦比從前堅決。該文並謂對敵人只有勝利或投降，漢奸的和平也即是投降。因此最高統帥勸我們，略謂「在抗戰第三年開始的時候，我們要立定決心，各就本位而作最緊張最確實的力。」這努力在精神方面，應奮發有爲，力守法令；在軍事方面，應注重政治訓練並加強組織。

我們深望全國人民，無論軍民，亦無論前後方，能深體最高統帥的昭示，抱最大的抗戰決心，各就其力之所及，以求增加我國的抗戰實力——無論是軍事上的或是經濟上的。庶幾我們今後可永無汪兆銘其人，而敵人的實力則日蹙月減，終至不能再事侵略，而太平洋和平可以永保。（平）

## 肅清私存烟土

民國二十三年蔣委員長所手定而經中央核准的六年禁烟兩年禁毒計劃是民國成立以來要事之一，而也是國民黨治下最大成績之一。蔣委員長對於禁毒禁烟向主嚴厲，自二十一年起在武昌剿匪時代，即已着手進行，以後行營移至南昌，成績更著。到了二十四年六月他自兼禁烟總監後成績更著。抗戰軍興後，他嘗於二十七年二

月解除總監職務，禁烟總會則移歸內政部，但他也曾多次聲明，國民政府禁烟的決心，決不因禁政改隸而放弛。他最近且下諭，稱本年秋季絕對不准再有一根私種。這更足以表示政府於二十九年底如期完成禁政的決心。禁烟計劃不受抗戰的影響誠可說是民族復興的朕兆之一。

如補充禁種起見，行政院認爲更有從速肅清私存烟土的必要，於是該院於本月四日通過「肅清私存烟土辦法大綱」，於川康黔等省先設「督辦肅清私存烟土公署」，責令該署於五個月內，將私存烟土由各該省署備價收買，交由禁烟督察分處保管。徵聞自去年以來，川康黔等省的不肖商人，鑒於禁種行將完成，以鉅資將烟土屯積起來，而以高價售諸吸者。這種投機買賣實在是最無良心的勾當。我們深望行政院現頒的辦法可以禁止這種勾當。同時我們更建議行政院，在不令國庫虧損的範圍內，將剩餘的烟土悉數焚燒。明年年底是完成禁政的限期，最好於明年六月三日林文忠公焚土紀念日，將各省收存的烟土悉數焚燒，以快人心，而示決心。在此以前，則不特將小量烟土以鉅價出售，出售至補足收買之價爲止。（青）

## 英國擴充對外信用放款的提案

日前英國商務大臣史丹麥向英國國會提出法案，擬將前爲增進英國一般利益而設之商業信用放款提高總額，自一千萬鎊加至六千萬鎊，此項信用放款，僅給與向英國國內各廠訂購貨物的國家，緣某國雖購置英國貨物，但因國內經濟困難之故，其在自由匯兌市場上所保有的購買能力，大受影響，今後自可昇以信用放款，從而促進英國對外貿易。誠以此際歐洲若干國家如波蘭、羅馬尼亞、希臘各國，正與英國磋商取信信用放款事件，此項談話尙未進展最後階段，是以貸與各國的確數，目下尙難確定，就大體言之，各關係國有予協助的必要，但不擬採取借款形式爲予放款，俾用以向英國購買軍械。至于放款期限，至少定爲二年或四年，至多可爲十年至

十五年。

這法案的用意是在使有關係國家利益的放款與尋常商業放款有所區別。

二俟 項法案由國會通過後，凡與英國保有友好關係的各國，均可得放款，在不列顛帝國各自治領中爲紐西蘭，在其他各國中，則以中國，土耳其，羅馬尼亞，波蘭，希臘五國尤爲重要。此項放款具有周轉之性質，換言之，一俟部份或掃數清償後，仍得依此限度再行運用云。

法案表面的理由是增進英國對外貿易。事實上，牠的政治的作用更爲明顯。所擬貸款的國家，都是英國所要拉攏爲與國。以支持民治勢力，以抵抗極權集團的國家。我們是極東主要民治國的代表，並且是唯一以實力抗禦侵略的國家。如果這法案得以通過英國國會（這似乎可以不必懷疑，因爲這是英國最低限度所應做的事），雖然此議的發端是由于波、羅、希臘諸國近

## 說爲政不在多言

這好像是一篇自己觸犯題目的文稿。它對讀者會有甚麼一種影響，連我自己也懷疑。說爲政不在多言的人，當然也不贊成一般的多言，如今希望人家不多言，而在表示這希望時，自己不能不先取多言的方式，或至少不能不犯多言的嫌疑；以戰事止戰事，似乎有人主張過，也或許有它的效力；但以多言止多言，怕無論如何是不會有什麼結果的。

先說一般的多言或少言。我們的傳統思想在這方面當然也不免受中庸哲學的影響，我們主張不多不少，恰如其分。所謂恰如其分，是不容易確定的，大約用時得參考三種事物：一是當時此地的需要，二是題目的價值大小，三是說話的人到底多少切實的話可說；不需要說而說，對小題目大放厥辭，或根本沒有許多話可說，而偏欲大發議論，聳人聽聞——都是不對的。還有一個參考點我們不能忘記，就是說話的人的動機與行爲和他所說的話是否符合，或至少是否在精神上不相刺謬。這一點似乎是特別重要，要是不符合

來正與英國磋商借款而起，中國當然應第一個受考慮的國家。

英國近來對於國際看法的覺悟尚然可以令人稍爲欣慰，然而我們這個辦法仍嫌不夠積極。英國一向「多財善賈」慣了，不免帶上一付做買賣的眼鏡，以爲凡事有錢便成，同時他們是一個有身分的國家，又生怕像寓言中的小貓，上人家的當，替人家向爐火裏扒取爆栗，所以對於出錢之外的更爲積極點政策都徘徊卻顧，不敢毅然決定。然而現在國際的形勢方急劇變化。「七年之病」一三年之艾」，徘徊卻顧之後的辦法，總是趕不上這急變的局面。這似是英國外交苦悶的癥結。我們並非漠視這擴大貸款的提議。尤其站在我們的立場，任何友邦的幫助都是我們所歡迎我們所感謝的。不過爲全部民治勢力及世界和平着想，沒有一個更積極的政策這絕望而馳的國際局面，總沒法趕得上。（完）

潘光旦

而衝突的話，那所說的雖只片言隻語，也是多了的

說話，以前文言叫做辭。根據上文分量的話，辭就可以有三種。分量不足可以叫做訥。恰如其分可以叫做達，所以有「辭衛足以達」而「辭達而已矣」的話。分量適當，不關緊要的我們可以說辭費，關緊要的我們可以適用一個不很好聽的字，叫做佞。佞在字源上的解釋是「巧詞高材」，從女，從信字省，有一位文字學家說，女子之信，近於佞也；這對女子無疑的是一個侮辱，不過無論如何，巧言利口的人叫做佞人，是二三十年來已經習慣了的。孔子最深痛惡絕的是這種人與近乎這種人所說的話，認爲究其極可以傾覆邦家。後代史家如司馬遷班固等，又根據這層意思，特開佞幸一傳，以昭炯戒。

民族傳統的說話的標準是一個達字；孔子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是做到了達字；修辭立其誠，而做到的也無非是一個達字。達是不容易做到的，

連而能文，尤其是能能可貴，終春秋之世，够得上連而文的，恐怕祇有一個鄭國的子產，居然賺得孔子「辭之不可以已也如是夫」一句不勝其贊歎的話。不過，祇是文而不達，結果就等於佞，這種人就多得不可勝言了。專掉三寸不爛之舌的游說家，利用五寸毛錐的文學家，以曲學阿世的思想家著作家，繼以修辭立誠的標準，怕十之八九是些佞人。鞅固生很不客氣的對公孫弘說：「子孫正學以言，無曲學以阿世」，正學以言是達人，曲學阿世就是佞人。維其如此，所以一方面我們儘管認定連字的偽的，一方面也未嘗不作退一步的主張，說與其佞，無寧訥；所以說，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又說，剛毅木訥近仁。禮與其奢也寧儉；不得中行之人，與其得鄉愿，不如得狂狷，全都是這個意思。

超越分寸的辭，何以叫做佞，似乎有再加解釋的必要。上文說所謂超越分寸，所以有三四個參攷點：不合時地，小題大做，虛辭濫說，都還是超越分寸的小者。最可怕的是最後的一種，就是不由衷，不立誠，而行爲不足以相副的辭。孔子的弟子裏，至少有三位，在這一點上換過先生的罵。季氏將伐顛與，孔子以責冉有，冉有拾出一個很大的理由，——有後主義的理由——來替季氏和自己辯護，說，今不取，後世必爲子孫憂。孔子說：「求，君子疾夫，舍曰欲之，而必爲之辭」。君子疾夫一句下，我們以爲應該補充一個字，意思才算完全，那字就是佞字，而舍曰欲之云云，就是佞字的解釋。第二個換罵的是子路。子路使子羔做費宰，孔子說他誤人子弟（賊夫人之子），子路辯護着說：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爲學。想不到二千四五百年前，子路已經會說近乎「讀書不忘教誨」或「學校就是社會，教育就是生活」一類的話。不過無論他如何會說，也正因爲他會說，終於討了孔子的一頓罵：是故惡夫佞者。因佞而換罵最多的無疑的是宰予。宰予專修的是言語科，照理是會說話的，不過會說話到佞的地步，自是他自修之功，非孔子教育之力。他和孔子辯不行三年之喪，提出禮崩樂壞的一篇大道理來，真教聖人措手不及；不過宰我的佞，終於改變了孔子的觀人之法；他說：

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於予與改是。心口不相應與言行不相符的人，可見就其一個無信之人，就是一個佞人。一個人的巧言利口，轉變了聖人的對人的信仰，其影響也不爲不小了。

冉有，子路，宰我應付孔子的話，我們現在往往叫做「說辭」，也叫做「自圓之辭」，其顯而易見和動機行爲不符的，我們一向也叫做「飾辭」，甚或「遁辭」。「遁辭知其所窮」，辭到了飾與遁的地步，當然本人既完全自覺，旁人也誰都認識，不至於引起甚麼問題來。不過近代心理學與社會心理學告訴我們飾與遁的程度往往是很難判斷的，不但旁人看不出說辭的人是在飾在遁，連本人自己都感覺不到。此種學問甚至於說，我們一切的辭，是很少有飾與遁的意味的。精神分析派的心理學，說我們的意識有兩界，意識本界與潛意識界，這兩界的劃分，因文化禮教的發達而越來越深刻；大凡情欲之事，最初可以比較自由表見的，到此便不能不深深的退居潛意識的背景之中，遇到要表見的時候，勢必先經一番文飾的功夫，方才可以經過意識本界，而呈露爲表面的動作。語言便是此種文飾的功夫的一大工具，於是便產生了各式各樣的自圓的說法。意國社會學家柏瑞篤也有一派性質相似的理論；他分析人的行爲，認爲每一行爲可以有兩個或三個成分，一是因，就是行爲的動因，二是動，是動作的本身，三是辭，是伴着動作同時發生的一些話。大凡一舉行爲，由因成動，大抵附帶着一個說明所以動的理由的說法。這說法有時候不說出來，即祇是本人肚子裏明白，有時候說出來，但不論或默或語，它總是一個辭。因，動，辭之間，因是最不變的成分，許多情欲就是因了，動的方式自然不一而足，但辭最是千變萬化。根據由衷與立誠的原則，辭的變化論理也不會多，但若說詞者的自覺或不自覺的目的在自圓，在文飾，在躲避譴責與批評，那就數不勝數了。這樣的辭與辭的系統是會引起問題的，社會學研究的印像之一便是這種辭，辭的系統，和它們所引起問題。

關於上文的一番理論，我們最好舉一些例子。一個人打牌，他大概不會

個坦白的說他喜歡打牌，他總會說，三缺一的時候，他才加入，否則折散人家變成之局是說不過去的；或者，他承認喜歡打牌，他會添一句說，打牌是他唯一的弱點，在唯一兩個字裏，他又找到了自圓的出路，增高了自己的地位。一個人娶妾，他大概也不會坦白的承認他好色，他却會說：他的大太太沒有生兒子；或他是一個兼祧兩房的人；甚至於他會告訴你，據一部分人類學者說，男人是有多妻的傾向的。魔鬼也會引經據典，這話真是不錯的，人既不免受魔鬼的誘惑，也就人人可以有此種引經據典的機會。這些例子是很淺顯的，無煩多舉，我們要注意的是，這一類的佞詞是我們生活中最普遍的一件事，初不限於打牌納妾一類的行爲。

上文說因是常的而辭是變的，因是一個，而辭可以有幾個，我們也可以舉一兩個例子。一個天主教徒反對信仰自由，自然有他的一套說法；一個社會主義者反對信仰不自由，反對宗教，自然另有一套說法；論起辭來，兩人之間，可以說是南轅北轍了，但他們的因却是相同的一個，就是，雙方都渴望着，把自己的信仰與行爲標準加在別人身上，不到全人類統一的境界不止。一個淫蕩的人可以說出許多變態不堪的話，同時一個道學家或宗教家所不憚煩瑣再三申說的當然是一大套禁慾與戒淫的話；論表面的辭，這兩個人又是大相逕庭了，但論內在的因，却也只有有一個，雙方都是不勝其性慾的衝激。一個崇拜偶像的鄉下老普通不大說話，他的教育程度也不容許他說許多話，但若問起他所以崇拜的緣由來，他會有一套說法，裏面真來一個改革家，大唱其打倒偶像的主義，表面上，這兩個人的辭更是涇渭分流了，但我們所能推究到的因却也只有有一個，就是雙方都能熱烈的信仰，而那改革家的熱烈與認真的程度遠在鄉下老之上，他信的是甚麼呢？他信的是進步，是科學，是社會改造的原則和若干改造的理想。他和上面所說的教徒與社會主義者一樣，很希望鄉下老肯很痛快的接受他這一套，不接受時，還不惜付之警察的武力；至於他的信仰是否比鄉下老的更可貴更有利，却是另一問題。

根據最後這個例子，我們可以知道，十八十九世紀以來種種改革社會的

學說，動不動講自由，平等，進步，民主主義，國家主義，社會主義，無不是一些辭的堆砌與辭的系統，其間究屬有多少自圓，粉飾太平與躲避現實的成分，又有多少經得起事實，經驗，以至於邏輯的整嚴的成分，尙有待於社會學者的斷定。我們要知道，這一類辭的堆砌與辭的系統，和許多宗教的來世界論，以及烏托邦主義的理想社會論，原則上沒有很大的分別，就思想與設辭的方法論，更不免是一邱之貉。用以前的眼光來看，這一類辭的系統所包含的，大部分是一些佞辭，而發爲此種佞辭的人自然是一些佞人，一些巧調高材與曲學阿世者了。我們在今日用到這佞字，當然不能再有以前那種濃厚的道德譴責的意味，那種深痛惡絕的態度，不過，這種辭與這種人是不健全的，這種辭不宜做我們思想與行爲的準則，這種人更不是先知先覺一流，值得我們信服，今昔的看法却應當是一樣的。

現在進一步的說爲政不在多言。

爲政不在多言是跟了一般的不多言的原則來的。「爲治者不在多言」是漢代的申公對武帝說的一句話，不過它所代表的原則是很老的。據說，堯舜垂裳而治，是不大說話的。詩經說文王：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孔子論充着說，聲色之於化民，未也。君子過言，則民作辭，也是一句很早的教訓。中國政治學說裏很注重法天的原則，天是不說話的，所以說四時行焉，百物興焉，天何言哉？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是漢代初年便已流行的一句話。

不過不言與不多言之教是一事，實地的民族經驗似乎又是一事。在三千多年的歷史裏，很不容易尋出幾個真正說實踐道不言或不多言之教的政治時期與領袖來。春秋戰國而後，三寸舌頭的用途也許不如從前，但是五寸舌頭的勢力，却比以前不知增加了多少。這一層顯而易見與儒家的發展有關。儒家的正名主義，道德觀念，以及一般的尙文的精神一方面既產生了胡適之先生所說的「名教」，一方面更形成了專用文字的取士制度，而文士對策

所搬弄的種種當然不外乎「名教」中仁義忠信一類的「名」或「辭」，搬弄的次數越多，就越變做一派陳言濫調。試看史籍中所留傳下來的詔令和對策的筆墨，真正可以免於新爛朝報的譏彈的，恐怕沒有很多的篇數。這種傳統的「精古右文」的風尚終於把中國造成了一個「名教的樂地」，「文字的家」。敵人說我們是一個「文字國」，是不錯的。不說別的，祇是敬惜字紙這一點就十足表示這種名教樂地與文字國家的精神。

前不多幾年，好像是蕭伯納罷，曾經說過英國是一個「議論國」；些微的小事，動不動要付議會討論，討論了許久，却未必有決議，有了決議，也未必真實行；替這樣一個國家上一個「議論國」的徽號，他以為是再配稱沒有。四方有一個議論國，東方有一個文字國，他真可以說無獨有偶！不過，就最近三十年的風氣看來，東方的文字國，也有同時變做一個議論國的趨勢。三寸不爛之舌，退隱了不少的年代，已經和五寸的毛錐同登壇坫，共同負擔起救國的大業來。這趨勢却真有點不測。一個議論國不大做文字，一個文字國不大發議論，在不做文字不發議論的空閒時間裏，終還可以推動一些切實的政治；如今中國却兼具了兩種身份，不發議論，便做文字，做罷文字，又發議論，甚或兩者分工合作，雙管齊下，試問還有幾許餘力來促進真正福國利民的政務呢。無論如何，爲政不在多言的原則，到此境界，是再也無法適用的了。

上文的一番話，決不是憑空說的；我想凡是對於已往二三十年的中國政治大體留意過的人都會有同樣的觀感。動不動開會討論的方法，我們從想採取英美式的議會政治的時代起，就學得很像；越到後來，參加政治的人越多；這方法自然是越撇不開，無論集會討論的精神如何，效果如何，反正這集會討論的格式已經成爲我們許多生活格式裏的一個。西洋人曾經評論我們民族，說是重格式而輕實際，這大約又是一例了。發宣言，拍通電，以至於快郵代電，在舊章檄文露布的中國人當然更容易成爲拿手戲，不須多說。比較新穎的是近年來我們對於宣傳，宣傳的方法，以及宣傳的工具如何報章，雜

誌，小冊子之類的信仰。政府要推行一種政策，以爲經過一番宣傳就一定可以減少民衆的阻力。黨派要推廣一種主張，也以爲一經宣傳，便可以造成一派輿論。其實問題並不如此簡單。西洋研究社會心理的人，大部分認爲宣傳的力量是很有限的，輿論這東西究屬有不有，是一個問題，要有的話，報紙一類宣傳的力量也祇能把它反映出來，而不能加以左右，更談不上創造輿論。假若輿論是風，那宣傳的方法與工具只好算是屋頂上的風針，可以指導風向，而不能轉移風向。至於口號標語一類的宣傳方法，其效力更自都以下，不值得計較了。

這一類爲政多言的方式不會有多大效果，還是小事，要緊的是它而有很大的流弊。多言的一般流弊，上文已經說過，到此我們要特別注意的是，爲政而不免多言，那多言是集體化的，流弊所及，必至危害以至於摧毀集體生活。即使我們假定，集會時的討論公布的宣言，張貼的標語，吶喊的口號，以及印發的各種宣傳物品，內容大都相當懇切，即至少不太背於上文再三編纂的修辭立誠的原則，這其間已經可以有兩種很大的流弊。一是思想與吐屬的刻板化。我們以前罵八股文章，罵的是它的刻板性與千篇一律的現象，其實現在罵八股文章的人十之八九自己沒有做過或根本不了解八股文章，否則，我相信他不會罵，因爲他明白在今日「多言政治」的局面之下，許多的文章比八股要刻板得多。我們要測驗這一點的機會實在是太多了。聽一次演講，讀一篇社論，參加一次座談會，翻看一本發揮一種社會理想的書，難都會很容易的發見一大套千篇一律，陳陳相因的字眼，名詞，語句，口氣，其數量之大與復出的頻數要遠在八股文中詩云子曰……之上。「洋八股」，「黨八股」，以及最近的「抗戰八股」決不是一些隨便起的名目，我們確有這些東西，而我們如今借用八股兩個字，似乎還得向以前的真八股道一聲歉；據心理學家告訴我們，以前的八股在字面上雖祇搬弄一些舊東西，在股的精神與題的搭聯等方面往往可以看出作者的天分來，在現行的各式八股裏我們看見的祇是一些思想的板本，連初印與後印都分不出來。

第二個流弊是語言替代了工作。我們跟了胡適之先生批評「名教」，爲的是「名教」很早就變成了「名」教。講孝、弟、忠、信、禮、義、廉、恥的人，講多了，講慣了，講油了，應手拈來，都成妙諦；他對這一類的「名」根本不求甚解；這些「名」在他的心目中，最初原不過是幾個符號，後來變做幾乎含着富有象徵性的圖案，終於成爲一些糊糊欲活，可以喚起情感，激發性靈的偶像。一個「名」到此境界，就好比一個佛號，可以供人熟唸，好比一道靈符，可以受人膜拜。元亨利貞，只要喊出口去，可以開邪趕鬼；驅除毒害，但須貼在牆上，可以不召自來。這在西洋，早有人叫做「字的巫術」，在中國，我們可叫做「名的宗教」。在這種巫術或宗教支配下的社會，無論它有多麼高妙的人生理想，多麼卓越的道德標準，生活是靜止的，文化是呆滯的，甚至於死板的，因爲，願望與祈求替代了努力，語言與文字替代了工作。二三十年來多言政治的一大弊病也就是這一點；名與字儘管推陳出新，改頭換面，其爲字的巫術與名的宗教却絲毫沒有變動。開過會，有過議決案，發表過宣言，向大眾宣傳過，一件事就算是辦了；用口號標語來傳播一種願望，傳播過了，這願望也就算是達到了。照這趨勢下去，我怕非鬧到一個使努力與工作的機能完全癱瘓的地步不止。

約言之，多言政治的兩個流弊的歸宿是：思想機能的僵化與工作機能的萎縮。一個集體生活，到不能思想與不能工作的境界，試問所剩還有幾許。不過，讀者不要忘記，我們還假定着這種多言是屬於未可厚非的一種，即還不太背於立誠的原則的一種。假若我們把這假定撤去，而發見多言政治的旨中間，有很大的一部分是屬於自圓與文飾的性質，其目的，消極的在躲避諷責，轉移視線；或積極的在迎合衆心，於中取利。蘇秦遊說，表面上爲六國着想，底子裏却爲自己博取富貴相；公孫弘以儒道進用，而明眼者一望而知其將以曲學阿世；安知目前多言的政治中，就沒有像蘇秦公孫弘一類的人與一類的浮辭虛說？假定真有這種情形，那前途的危險就更在思想僵化與工作萎縮之上了。究其極，它可以摧毀集體生活與政治組織所憑藉的最大原則

，就是「民無信不立」的一個信字。人言爲信，信。信。信。相反，上文早已暗示過了。

申公對漢武帝說的，本是兩句話：爲治者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就其多言的流弊，端在力行。一般的做人如此，爲政更不應不如此。行政的推動，在人事方面，靠兩個條件，一是官民的領導，二是民衆的合作。官司宅心純正，公忠體國，個人的行爲與私德上又無懈可擊；同時民衆的智識程度與團體意識也已經到達相當的水準；在這種情形之下，要推行一種政治，是最容易不過的。假定二條件之中只得其一，即民衆的程度還不到家，那末，一件政治的能否推動全得看爲政的人的宅心與行事了。無論有的是一個條件或兩個條件，多言總是沒有地位的，具備兩個條件時，是無須多言，只有一個條件時，多言了也是不生效用。所以孔子說，下之事上也，不以其所令，以其所行，又說，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榜樣的原則是中國的教育學說與政治學說的最大重心，也是兩種學說所由融會之交點；這個原則，在今日多言的政治下，已經有被斷送的危險了。

近年來的多言政治不但違反了我們民族文化裏很大的一個原則，並且也有背乎孫中山先生的遺教。孫先生倡爲知難行易之說，在政治方面是有很大的實驗的價值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兩句老話，我想孫先生一定是不贊成的；任何主張民本主義的人不會贊成，不獨是孫先生。不過我們處的是一個不進則退的時代，我們在複雜的國際局面裏，亟於要取得一個地位；我們要推動種種政策，勢不能在短期內讓大眾都了解這種政策的性質，與其因何要推動的理由，與如何能推動的方法，亦即勢不得不由領導政治的人當機立斷的做去，只要做的人動機純潔，手段正當，上面推動，下面自然諒解，終於可以達到我們改革的目的，而民衆於協力合作之際，也自然會明白一切因何與如何的道理。如今我們似乎並沒有遵守這種遺教，我們在想推動一件政事之前，領導的人中間，總要先費上許多口舌，接着對民衆又費上許多口舌，無形中表示給大眾看，要推行這種事，還得讓大眾有一個了解的機

會。每種貨幣之價值，而行是第二步，知還是容易下手，而行難得從緩。這不  
是等於到了知易行難的舊說了嗎？表面上服膺了孫先生的新說，而實際上  
履行的還是舊說，更無異默認了孫先生知難行易的新說，也無過於知易行難

## 最近外匯的變動

李卓敏

一在過去一星期中，上海外匯市場，十分平穩，即期匯率仍舊，預期匯  
率堅定，異常之採購並無；是以由平準基金所售出之外匯數目甚小。除上述  
之外，市場情形，無足佈告。一這是六月七日前的一周星期上海匯兌市場的  
實在情形。七日是最近我國法幣劇跌的一天；而七日的前一個星期，外匯市  
場却穩定得很。這最有力實地證明了這次外匯價格由八便士多跌到六便士左  
右，完全是我們政府自動採取的方策，而非市場中購買外匯者極多，以致政  
府不能維持八便士的一個匯率的結果。就是到了七日這一天早上，市場還料  
不到匯率要變更，這可從下列例子看出：香港市場，開盤的價格，仍是八便  
士，到十時後始突跌。

但是，法幣匯價要更改的謠言，事實上早已出現。五月初旬，上海已有  
法幣將跌價而購買亦將加以限制的一說。據說這謠言沒有幾天就過去了。預  
期匯率的變動，最足以代表一般投資者及商人對於法幣的信心。觀察七日前  
預期匯率的堅定，就可以知道任何人對於法幣的信心，並沒有搖動。

法幣跌價，既非因市場劇變，又非因信心動搖，則其原因何在？政府為甚  
要自動的把法幣貶值呢？這問題當然不容易回答。我們於得到許多有關係的  
事實後，才能有準確的分析。不過最重要的原因，或可以在報章上看出來。  
有人以為上海華興銀行之設立，是法幣貶值的近因，我以為原因並不在此。  
華興銀行於五月十六日成立的。據上海金融商業報記載，華興紙幣紙流通紅  
口一帶，而數目不過數十萬元。所以我以為華興銀行用發行貨幣方法，來  
獲取法幣以購買外匯，遂使法幣不能不貶值以應付之一說，是把華興銀行看

的舊說的支配：這未免是太不對了。所以即為實現孫先生的知難行易的學識  
計，我們在一般的生活上，尤其在政治生活上，有實行申公的兩句話的必  
：少說話，多做事。

得太重要了，敵人在華北和華中用種種方法換得法幣去買外匯是事實。他們  
於最近數月來究擁有多少法幣，無可估計。假如數目很大，所以我方預將匯  
率降低，以防套取外匯，當然是可能的。不過這與華興銀行的原因就不關了  
。

我以為外匯跌落的真因，是在上海的入超，自今年三月十日外匯平準基  
金成立後，上海外匯之供給，幾乎全靠平準基金的售出。資金售出之外匯，  
都應商業的需要，據海關佈告，本年三月上海入超，三千二百萬元；四月入  
超，二千四百萬元；五月份入超，三千九百萬元，海關入口統計，是以中央  
銀行掛牌匯率（十四又半便士）計算。如以實際之匯價（八便士）計算，則  
三月份入超為七千五百萬元，四月份為七千萬元，五月份為九千八百萬元。  
以英磅計算，三月份入超為二百五十萬磅，四月份入超為二百三十萬磅。五  
月份入超為三百萬磅，則自平準基金成立以來，支付上海入超數目，當在七  
百八十萬英磅左右。上海近月來最大宗的進口是棉花。華北棉花來源幾完全  
停止，而上海紗廠復業待開工者很多，是以棉花進口，突然大增，約佔進口  
貿易的三分之一。就今年一月二月三月全國國外貿易總值而論，則比去年同  
期增百分之七；如在總值中減去上海的數字，則結果比去年同期減百分之二  
十三。上海入超的重要，於此可見。平準基金在成立時，數目有一千萬英鎊  
；而這三個月來上海的入超已達七百萬英鎊左右。雖然入超的外匯需要，不  
一定完全靠平準基金，然而入超對平準基金的壓力，是很清楚的了。

從下面的討論，更可知入超與外匯政策的關係。



我們這次匯價改變，起先頗有人以為有國際政治的背景。在外匯變動後幾天，許多人疑懼這是英國改變遠東政策的影響。現在過了兩個多星期，事實已很明顯地表示，英國遠東政策沒有改變態度。其實這不應有懷疑的餘地。本月十三日英國議會開會時，有議員向財相西門詢問中國法幣跌價及外匯平準基金會停止運用之原因。財相親自答覆，答覆句話，均引用六月八日在香港所發表之公報——此公報乃香港中英合組之平準基金委員會發出者，西門財相謂之為「最完善之情報」。六月八日的公報是怎樣的呢？「如一般人

所知，在過去數週間，中國法幣平準基金並未感受壓迫，中國法幣信用，絲毫並未搖動。但在昨星期三日，暫行停止維持，俾大洋兌匯價值，自行尋求一更適應之經濟水準，使出入口貿易，臻於平衡。回憶一九三八年六月時，亦曾採取同一措施也。其時水準價為八便士，而此價格維持成功至十二個月之久。現新水準已經發現，并能穩定的支持，此可為深信者也。中國以前由外輸入之若干種貨物，國內皆能製造。據各地情報，今年豐收可期，此又可以減少輸入。中國政府購買軍火及其他供應品所需之外匯，業已安排就緒，而不須經由匯兌市場。最後，平準基金之實力，業已加強，而此項基金基礎，又更增廣，均已成功，故當局維持對外匯價之能力，絕不成問題。現更作進一步聲明，此次中國法幣對外匯價，雖一再更易，惟仍極得人民之擁護與信任，查仍隨時可以換得外幣也。」根據這「最完善之情報」我們可以知道英國繼續幫助我國維持匯價，平準基金業已加強，而此次匯價之改變，完全因欲使出入口平衡所致。

法幣跌價，雖然是政府的政策而非束手無措的結果，不過改變迅速，市場信心的搖動，是不可避免的。所以七日後資本逃亡的加厲，在上海市場看得很清楚。於是財政部有電令上海各銀行在二十二日起停假三天的計劃。以此非徹底辦法，遂於廿一日電令上海中央、中、交通、農民四銀行，銀錢業公會，及市商會，自二十二日起，上海銀錢業提取存款，除政府需要及撥放工資外，每週支取數目，在五百元以內者，照付法幣，超過五百元者以匯票支付，專供同業轉賬之用。如有將存款移存內地者，不在此項限制。這個辦法，完全是為減少法幣在上海市面的流動，以免對外匯市場加大壓力！匯票是不能換取外匯的。結果，上海市場頭寸立即短少，間接就把國幣在外匯市場的價值提高。二十二日午，法幣的匯價，竟漲至七便士。

法幣貶值的根本原因，是出入口貿易不平衡。祇限制銀行提款，並非治本的方法。本來穩定外匯匯率，離不了國外貿易統制。僅求匯率的釘住，而讓出入口貿易自由，是一成不變的方法。英國於歐戰時把英鎊釘住在美金的一個匯率下，兩年多的光景，共費了三十萬萬美元！我國自去年三月實行統制外匯辦法後，對於對外貿易的統制，並沒有一貫的政策，出口貿易的增進，由貿易委員會負責。出口商人須向中交兩行結匯，而匯價之給與，是依照官定匯價（十四又半便士）。如出口商人能將出口所得外匯在暗盤市場出售，價格是在八便士多，能換得法幣，當比結匯下多百分之四十三以上。故官定匯價之維持，反令出口貿易發生阻礙。至於入口貿易，從來沒有直接管制。進口商購買外匯，按法須向財政部請求，所以理論上財政部能够從核發外匯上使不需要的進口減少。但事實上，商人仍可在暗盤市場購買外匯，繼續進口。這種情形，在淪陷區的上海，尤為明顯，政府維持八便士的自由市場匯率，就是等於對進口貿易，完全不加統制！結果，平準資金受人壓力，是個自然的情形。現在把匯率減低至六又半便士，而不限制進口，鼓勵出口，恐怕這匯率也不能維持很久。

財政部七月二日公布對平準國際收支兩項辦法，目的就是要解決上述問題。

難，辦法的全文，在報章上都已詳細披露。最重要的，關於出口結匯，是將官定匯價與自由市場匯價的差數，補足出口商，銀行祇收百分之三為手續費。却是法幣的支付，祇能在內地地點，以免法幣外流對外匯市場增加壓力，出口商人年來之結匯困苦，於此得一解決。桐油，茶葉，豬鬃，及礦產四類，因貿易貨價值儲料有關，完全由政府收購運銷。

進口貿易，亦加以統制，以海關為統制的機關。統制的辦法，是禁止一部份進口商品之輸入——這種商品，都是（一）非抗戰建國及人生日用所切需者，或（二）本國內有代替品者，或（三）多由敵國產製輸入時容易冒牌侵蝕一切物品者。關於這些商品的名目，報章還未登載，所知道的是海關進口物品十八組二百三十四種稅則號列，均一律禁止入口。海關進口物品，共有三十二組，所以以後能繼續進口者僅十四組。據財部公布，照去年進口口額推算，約可省出二萬三千餘萬元。去年全年進口價值八萬八千六百萬元。如這推算能夠實現，則以後進口貿易，可大約減少四分之一。照六又半便士之匯率計算，可省約五萬萬元。去年全年出口總值為七萬六千三百萬元。如以後禁止輸入商品不入國境，而出口貿易可以維持，則我國可變成一出超的國家。照去年數目計算，除去禁止入口之價值，我國可得七百萬元之出超。

不過以後能否藉海關而求進口統制，是一問題。論陸區與海關行改，

## 近代民族主義之產生

谷春帆

何謂民族，何謂民族主義，俱不易下一定義。大凡說來，一個人羣的雜拌，因為歷史，血統，或其他種種關係，自認為一個集團，自覺地認識全體個員的集合是一個個體，這個體即成為民族。在古代及野蠻民族中，集團的範圍甚小。團員皆著共通生活，彼此之間，確有實質的利益一致關係。現代民族，早已超越了這個界限。但現代民族間各自，雖無實質的利益一致關係，而卻有哲學的與抽象的齊一；論在政治上，經濟上，社會上，使民族團體，感覺著一種深厚的一致；因而能自覺地，有計畫地，在國際關係上，

已受敵方牽制不少。我們事統制進口，敵人會不會藉口而對海關行改作進一步之侵犯，這在最近的將來就可以知道，財部所公布辦法中，有禁止輸入商品，不許轉口及郵遞一項，想是為應付這個困難而設。然而轉口入我們後方的商品，為數非鉅，淪陷區裏的進口，大部分還是消費在淪陷區裏。如此，則統制入口，能否對維持法價有大幫助是個問題。維持法價於六又半便士，就是等於無限制的在上海及其他市場售出外匯。假如淪陷區的貿易，不受統制，則維持法價的困難，仍不能解決。這一種是希望當局加以考慮的。

最後，還有一個重要的問題，當局尤須考慮的，是物價問題。法幣再貶值，自然人心搖動，恐怕通貨膨脹。加以進口貨物的價格因匯價跌落而高漲，就很自然的令國內各種物價高漲太快。有時很可以使物價高漲的速率比匯價跌落的速率更大。到了那個程度，情形就，能好轉，整個貨幣制度要感受威脅。所以在自由經濟制度下，要統制一方面經濟的活動，結果不能不統制整個的經濟活動。政府對物價統制，已有相當的措施，不過邊緣不普遍，還嫌不着力。以為物價的積極統制，不應再延擱了；藉現在物價尚未飛騰，統制進口剛開始的時候，就應實行積極統制物價。至於統制物價的問題，則不在此討論了。

主張這個體抽象利益，高於別個個體的利益，並且高於全體人類的利益；爲了這個體的利益，要求其各團員之服從，擁護與犧牲；使這個體神化，宗教化，意識化；使感情的，衝動的，民族意識，得到哲理的根據與宗教的信仰；這就是近代新興民族主義之本質。

在這種新興的民族主義下，這一羣雜拌的人口，所謂民族也者，其利益高於一切，其榮譽重於一切，無論是抽象的，或實際的，不許受人傷害。可切利益，歸之民族，一切榮譽，歸之民族。民族是最高的，對理智的不顧

解釋，並且是不容模稜的。

近代狂熱的軍國式的民族主義，本來均是戰爭的產物。戰爭本身是一種瘋狂心理之表現，具有詩人藝術家狂醉沉湎的心境，與宗教家犧牲忍耐的精神。在這種狂醉心理下，人不是自主自由的動物，而是一種手段，一種作料，一種作爲民族光榮與民族利益的作料與手段。非但少數人的利益，要爲民族而犧牲，即全體民族的利益，也要爲了民族而犧牲。民族本爲全體民族之集合體，到得全體民族之利益，要爲民族而犧牲，民族即已超出全體民族之上，而自成爲抽象的神靈。

從本能的衝動的民族意識，轉變到宗教的神化的近代民族主義，是中國抗戰的大成就。中國在梁任公的新民報時代，本已介紹過西洋十九世紀的愛國思想。但當時是十九世紀崇尚自由，理性與民權的愛國思想，與近代民族主義之反自由，及理性反民權的思想，完全不同。而且這種愛國思想也未十分生根。五四運動時中國民族復興意識，已經進步的多。然而當時的民族意識，連孫中山先生的民族主義在內，顯然痛切感覺到民族復興之急需，却還沒有將民族及國家利益提高到一切以上。這從孫中山先生之以民族與民權民生並講，而諄諄致意於心理建設及平均地權，節制資本等社會政策上，可以看出。孫先生的態度，是每個合理的中國人的態度。承認民族復興的重要，同時也承認國民生活道德政治等問題的重要。而且每個問題，是互相牽連的。如其沒有特殊的環境逼迫，使某一點特別顯到重要，則各個問題，從一般人看來，幾可以說是無所軒輊的。然而抗戰改變了一切，改變了環境，使民族及國家的利益，高於一切了。

抗日戰爭是中華民族存亡絕續爭死生於呼吸的一戰。經過十年的苦戰，國都淪陷，敵騎深入到西陲半壁。全民族覆亡的危機，迫在眉睫。人人心中感覺到覆巢之下，焉有完卵。因之民族及國家的利益，自然要受到最高的重視，而一切經濟政治道德思想等問題，只有在民族自主，國步完整之時，方能有解決的希望與解決的辦法。

在中日關係極度緊張的時候，民國廿四年十一月第五次國民大會開幕大會，蔣主席聲明「和平未至完全絕望，決不放棄和平，犧牲未至最後關頭，決不輕言犧牲」。當戰爭初起時，我們自稱爲「應戰」，表示不得已而戰的意思。當時雖然也提到民族意識，如蔣委員長民國廿六年十二月告國民書，即說「憑藉不仁武器與軍備，而在強毅不屈之革命精神與堅強不拔之民族意識」。民國廿七年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宣言，在民族主義裏，也提到發揚民族之固有道德，恢復民族之自信力」等語。但宣言中更明白說中國於日本國民無所仇恨」。並且更說「政府對於人民之自由，必加以尊重。

「民族國家的利益，除却下意識外，還不會公開受到最高的重視。隨着戰事的深入，而民族主義的旗幟，亦日益鮮明。「抗日高於一切，一切服從抗日」。中國本是爲了自衛生存而抗戰。如照事實說，抗日原是爲了一切。抗日是手段，而一切才是目的。現在反過來說，抗日高於一切，一切反要服從抗日，則抗日本身成爲神化。不獨在字義上，即在心理上，抗日亦超越一切而居於主宰地位。這樣具有詩意與醉態的狂熱的心理轉變，是戰爭造出來的，也是適應戰爭所必需的。抗日雖是爲了一切，而在抗戰的過程中，一切有賴於抗戰。抗戰失敗，一切消滅。所以隨着抗戰時期之進展，我們不但更深切認識了民族主義的本質，並且能够比以前用更清楚更澈底字語表示出來。民國廿八年三月十二日公布的國民精神總動員綱領，就是最清楚的中國式的民族主義教科書。（我說他是中國式的民族主義，因爲其中含有很濃厚的中國理性在內，與德意式的現代狂熱的民族主義不同。國民精神動員的第一個共同目標爲「國家至上，民族至上」，「鞏固民族生存應先於一切」，「國家民族之利益應高於一切，在國家民族之前，應犧牲一切私見私心私利私益，乃至犧牲個人之自由生命，亦非所恤」。這比廿七年國民黨臨時代表大會宣言，是何等彰明較著，並且「在此解決國族存亡之軍事期中，國家民族之最大利益爲軍事利益，所以國民一切之思想行動，均應絕對受國家民族軍事利益之支配，爲達到軍事之利益，爲增進軍事之利益，國家民族得要求國民爲

一切之犧牲，……達成最後勝利之目的。故當然的成爲「軍事第一，勝利第一」。『黨志集中，力量集中』。救國的道德爲「對國家盡其至忠，對民族行其大孝」。此種強有力的中國式民族主義色彩之表現，非但以前中國史上所未有，亦爲抗戰以來所未有。他不獨表示了中國之民族主義，並且表示了中國自衛求生的民族主義與近代瘋狂侵略的民族主義之不同。他指示了中國式民族主義之中道正行。中國共產黨對於中國民族主義的表示，也一樣深切著明。中共六中全會指出中華民族當前緊急任務十五條，其第一條即爲「高度發揚民族自尊心與自信心」；中共中央復稱中國「是中國人歷史上生息休養創造奮鬥的地方，是神聖不可侵犯的」。『見中共中央爲開展國民精神總動員運動告全黨同志書』。本來中國共產黨，隨着蘇聯作風的轉變，早已傾向於民族主義，早就主張聯合抗日，就提出「動員一切力量，爭取抗戰勝利，一切爲着抗戰，一切服從抗戰」的號召，也早以爲「只有爲着保衛祖國而戰，才能出全民族於水火，只有全民族的解放，才能有無產階級與勞動人民的解放」而尤其可注意的，是其中國式民族主義作風之傾向。在理論上毛澤東氏首先指出要「把馬克思主義應用到中國具體環境的具體鬥爭中去，……便要使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現中帶着中國的特性」按照中國的特

## 歸途

### 上海書札之一

我們循了公路到江鎮。兩個月前兩個二分之一的皮丘林（Pechurin）從海上來，一個降着細雨的早晨他們在這里登岸。我在這里請求我的朋友B原諒，他其實是一個不大到家的生活趣味主義者，正同我一樣和上面所說的英雄沒有四分之一的關係。我們原先的計劃是不再到這里來了，也嫌許多旅行家。但是上天的計劃比我們有力，他使我們重來這個濱海的小鎮，使我們第

點去睡用他，作成「爲老百姓所喜聞樂見的中國作風與中國氣派」（見毛澤東論新階段）。共產黨機關報「解放」也大談其忠孝仁愛信義和平禮節廉恥，認爲是中國共產黨的道德。（見解放第七十一期，廿八年五月十五日）。

吾並不是滿於樂觀，以爲政府的告諭，就可以作爲中國已有民族主義的證據。中國民族意識之紀律化主義化，甚至中國民族意識之復醒，如其沒有抗日戰爭作催生劑，而單靠教育的力量來普及，需要相當時間。謝謝日寇的侵略將中國人夢寐以求的民族主義，打到窮鄉僻壤樂天安命的老百姓腦中去了。在平時他們可以不知道中國是被皇帝或總統所統治，而現在在抗戰下，他們不能不覺得自己與民族的運道，死活不能兩立。他們認識了國家的重慶。他們與國家有利害一致之點，是生死與共的利害。殘酷的事實，用不可思議的代價，做了任何廣告推銷員所不能做的奇蹟。主義經過戰爭傳播到大衆中間戰爭是鍛鍊民族主義的洪爐。戰爭愈深入，愈長久，愈殘酷，民衆對日寇所受的痛苦愈深，並極愈大，仇恨愈重，民族主義愈發展。只有對於已經，對於現在，還有難戀的沒出息人，才會動全動搖而想投降。大羣民衆，已經失掉一切。在抗日奮鬥中，除了日寇殘暴的壓迫與洗不清的冤恥以外，他們更沒有可失的東西。

### 蘆焚

二次看一看這里的海灣和江水。

現在像是在「鏡花緣」里，我們將乘着如同玩具的小船從一些綠色的只有鳥類生活的小島中間穿過。我們自然並不希望這樣，不過我們有一個決心，一個主要目的：利用一切方法回到上海。你也許以爲可笑，如果不到上海，我們便覺得似乎已經和世界隔開。於是我們又打了一次敗仗，一個禮拜的暴風雨把我們的時間吹走了。我們和行李一同到了碼頭，在一家烟紙店的家門上看明了船期。

「五點鐘，」這意思是我們來得還等湊巧。

我們儘管爲我們的幸運高興，輪船上却接到一個電報，從上海拍來的，他們不開了，他們也許永遠不開了。

「上海又怎樣了呢？」

沒有人明白。港口好像一個心臟，它仍舊活動着：水手，妓女，脚夫，造船場。也許是心理作用，這些動作在我們看來似乎含着一種不安。我們是既不能去，也不得前進，自然誰也不喜歡一個禮拜，兩個禮拜的，沒有希望的站在岸上遠遠的望着混濁的海灣，在這個充滿了海味腥臭的小鎮上住下去。

現在還有一條路：我們溯江而上；雖然沒有人担保這條路能否走通，我們已經懷疑到一種變化。

「我們又走到原定的路線上去。」

我們可以看一看聞名于世的紹興的酒壩和鸞缸和我們兩個月前在杭州的故居。當晚八點鐘有一艘小船上航，在我們坐的「大餐間」里聽一些做生意的意見之前，我們要延一延這個小鎮。它大約有五百家住戶，一個海關，一個警察局，三家轉運公司和輪船公司，一個鐘表店，一個造船場，四家或五家箱子作房，兩家也許是三家旅館……附近有幾座小山岡。自然是正和許多只有在商業上才存在的地方一樣，它給人的印象是混雜醜陋，幾座高塔——幾個銀行和船公司的辦事處使人聯想到前代的豪華和地主，只有放着許多預備做龍骨用的木料的造船場上，只有從粗劣的，沒有個性的，或是說還沒有長成一種個性的市屋中間走到這里的時候，你才可以喘一口氣；你可以想像到一百年或是五十年鐘，第一艘用火行駛的洋船還沒有開進這里的海口，像小說上所描寫過的，所謂帆船林立，人們駕了鷄兒似的帆船到海上冒險的情形。

我們應該回到碼頭上去，天色已經完全黑下來了。這裏的燈火很少，而且沒有精神，假如打一個比喻，譬如我們都睡過午覺，忽然間輕輕的有一

點震動，我們醒過來了，我們睜開眼，我們的眼——這裏的燈火就像我們那時候的眼一樣昏花朦朧。你自然以爲這情形不大合理，對於那些脚夫狗其不便，但是你應該知道這里沒有什麼漂亮人物，假如有人因爲職務上的必要被派遣到這里，他會以爲等于充軍，其餘的人們，一些苦力，一些脚夫，幾個小販和娼婦，不管怎樣的路在他們走起來不都是一樣的嗎？

現在請小心你的腳，這裏的路是這樣不平，這樣泥濘，又有這樣多水潭。從海上來的風送來了晚涼，我們總算到了碼頭上了。沒有船開進港口，也沒有船駛往海上，脚夫們衝了烟袋，因爲沒有貨物等待搬運，坐在碼頭上悠悠望着海灣。走私者在暗影中翻牆。兩個穿黑衣的修道士——兩個娼婦互依着，好像兩姊妹，她們和烟紙店的女店主談着話，又互相戲謔，不時的發出笑聲。從那面，從江上又忽然響起口哨。在昏暗中，人共江水在星空下翻騰。沒有紛擾。沒有在這種地方我們常常聽到的不安的聲音。空中有發光的鱗片狀的薄雲，初五六的月亮快落下去了。假如你有機緣身臨其境，你將也不免神思恍惚，有永恆或偶然之感。

「你看船桅上的燈火；」

「和它應照的，你看還有那邊的遠嶺和這面的近山；」

「不過這些都離不開江水；」

「我倒以爲最重要的還是景物朦朧。」

昏暗的燈火，發光的薄雲，西沉的月，遠山近水，於是兩個說話的人心裏浮起半句舊詩，一幅圖畫：月落烏啼。正當嘆息自己不通繪事的當兒，船離開市鎮，在前面是萬山叢起。

當夜——大約是兩點鐘左右——我們無意間在旅館的桌子上看到一張地方報紙。

「上海也打起來了！」

「上海也打起來了！」

我們翻着報紙，但是除了從無線電收得的這一條簡略消息之外，找不到

任何有關係的其他記載。蚊子飛翔着。我們都很疲倦。

然而人事有這樣的意外。第二天上午——其實應該說當天十二點鐘——我們在某城換車，正和大部分在內地旅行過的人所經驗過的一樣，這在中國似乎是很當然的，我們遇到一件麻煩事情。在這里我很想恭維一下那地方的民團老總們的認真精神。但是我不能夠，我相信他們的本領不啻捉住一個最小的，即使是每天僅值五角到兩塊錢的漢奸或間諜，他們是僅僅爲了一百元的獎賞發了瘋了。假如你懂得中國人的心理，你便會相信這種猜測不錯，你會感到一種羞辱。

我完全沒有怨恨之意；況且三十年來我們中國有一句口頭禪：我們的文化太落後。這口號可以任意用任何地方，因而原諒了一切錯誤和愚昧。現在我們又要改變我們的計劃了。我們不再看紹興的酒壺和蕪缸了。然而這種性也並非毫無代價，我們無意間在一個地理書上從來沒有注意過的，一個我們沒有想到的地方生活了將近一天。我們一喜，你知道一個旅行者應該有這一喜，早晨我們還在一個地方——地球的某一點上吃粥，到了下午，我們卻踩了地球的另一點上的街道，在一個奔波了一天的人看來，他會經過各種意外，因之各種事物似乎都走了原樣，都有些神奇。我們吃了它的飯館，睡了它的客店，雖然它本身在世界上沒有一樣出名。當我們驚異到生命的不可思議，我們已經睡到一家客店的床上了。

客店完全是舊式的，在這小城里——凡到諸如此類的小城里來的人他們

## 美國與中日戰爭 (通信)

先生所述貴國現處的地位令我非常感覺興趣，而且也十分能令人置信。在過去二十餘個月內，我從不信日人已獲得勝利，我甚且從不信日人能獲勝利。他們如不能利用佔領區域內的富力，他們決不能獲取勝利；要能利用富力，他們又先得緩靖地方，收拾人心；但他們的殘酷行爲及中國人民對他們的恐懼已使他們無法緩靖，無法收拾。以我所知，日人已準備長期派五十萬大軍駐守中國。他們自以爲將有力維持如許大軍。但我深信其無此力量。

在敵國方面，我們對於戰爭的態度素亂而又缺乏一定的政策。沒有一個

大半都有自己的家或親友，它平時不會有什麼客人。它坐落在一個小巷里；它有一個正在廳堂里的樓梯，在昏暗中你摸索着爬到樓上，你看不出這是通往迎來的客店，因爲你正站在供着家神的一間大房子中間。然後茶房——也許他今天上午還在茶館里吃茶或在城外鋤地的——他引導你穿過你來時沒有注意到的一個小門，好像用了一種魔術，你忽然站在走廊上了。這時候你才發見這里有幾間小屋。茶房爲你打開其中的一間，一股古老氣息，一個掛着土布帳子的床，一個漆方桌，一把舊式的椅子。這些傢具都是五十年以至一百年前的式樣。你掀起鼻尖聞了聞，接着又皺了皺眉，你不大滿意，你覺得太離脫了。茶房也知道你不大滿意，他裝着不知道，問你開不開飯。這裏的旅店是帶飯的，你不要開飯，你可不得不住下來。

我們也跟你一樣住下來了。這裏的泥土牆壁使我想起我們鄉下的老屋，我喜歡它的泥土顏色以及泥土氣息；後面有一個小小的泥窗，木板做成的窗門是開着的，從這裏可以望見後面的草園，一株正從下面長上來的桐子樹，外面正在下雨。雨中的草色以及樹木又使我想起小的時候，每逢這樣天氣我總感到哀愁。一人道山長山又斷，生活極味派先生，喜歡泥土的鄉下先生，現在你們怎麼辦呢？

有自北面逃來的人家我們未來之先已經佔據了樓下，我們唯一的希望是我們不再碰到意外。

人對於美國在戰爭中能處的地位是痛快的；但除不痛快外，也沒有一個人知道如何應付。你可以了解，我們朝野現正以全力注意歐洲大戰的序幕。大家都明白，西方各國迫近戰爭已一年餘，如果戰爭一旦爆發，無論美國加入與否，他定必不利於美。一般人總想如可以不加人，便不加人，所以許多人都想避免一切可以促成大戰爆發的事件。因爲大戰的迫近，有一班人的孤立主義反而加強。凡是相信美國無法減輕或是消滅大戰的苦痛的，門必主張美國應賴大洋爲保護，而守獨立主義。你可以從此知道，爲何敵國可能足以使民衆減低對於遠東的注意，而增加對於遠東採取任何行動的躊躇。



內政部雜誌登記證警字第六九〇七號



寄航空信！

迅速 詳盡 省費

空中旅行！

快捷 舒適 安全

重慶 香港 河內 成都 漢中 西安

桂林 蘭州 寧夏 西寧 涼州

均可通航

歐亞航空公司

總公司 尙義街三號